

**JG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Studies*

**JGSS** Vol. 1, No. 1, 2026, pp. 31-43.

Print ISSN: 3105-1294; Online ISSN: 3105-130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GSS.26.1.04>



##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及成因探析

马晓坤 (MA Xiaokun), 陈思怡 (CHEN Siyi)

**摘要:** 南宋宗教空间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分化与组织特征, 结合地图可视化结果可见: 佛寺呈现环西湖层累分布特质, 道观在统治者主导下形成由内向外势力递减的梯度分布, 民间信仰寺祠多环太庙分布, 呈现向心式集聚。临安宗教空间的构建体现出地理与文化的深度嵌合、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资源博弈、以及移民与原住民在城市空间中的互动适配。地形、礼制、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宗教区域分布的有机格局。临安宗教区域的分布与文本书写, 反映了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 展示出宋人从“王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关键词:** 临安; 宗教区域; 地理分布; 文学地理

**作者简介:** 马晓坤 (通讯作者),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古文学与地域文化, 电邮为 [acongma@163.com](mailto:acongma@163.com); 陈思怡,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电邮为 [1549862933@qq.com](mailto:1549862933@qq.com)。

**Title:** A Probe into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ve Causes of Religious Sites in Southern Song Lin'an

**Abstract:** The religious spatial layout of Southern Song Lin'an reveals a highly differentiated and organized structure. Mapping visualizations show that Buddhist temples were distributed in concentric layers around West Lake, Taoist temples present a state-dominated hierarchical pattern with diminishing influence from the political center outward, and folk belief shrines clustered centripetally around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The construction of Lin'an's religious space reflects a profound interweaving of geograph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a negotiation of resources between imperial politics and local society, and an adap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migrants and inhabitants with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Factors such as topography, ritual systems,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 collectively shaped an organically ordered spatial configur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Lin'an's religious sites, together with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texts, reveals a mechanism of cultural identity shifting from "space" to "place", which marks a transformation in geographical consciousness among Song people from "royal city center" to "lake-and-mountain center".

**Keywords:** Lin'an; religious sites; spatial distribution; literary geography

**Author Biographies:** MA Xiaoku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Professor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E-mail: [acongma@163.com](mailto:acongma@163.com)); CHEN Siyi is a Master candida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1549862933@qq.com](mailto:1549862933@qq.com)).

Received: 14 Oct 2025 / Revised: 30 Jan 2026 / Accepted: 05 Feb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 2026.

临安是南宋政治与礼制中心，也是全国人口流入与市场经济高度集聚的都市。其吴越以来“东南佛国”的宗教传统在南宋进一步繁盛，全城宗教建筑大体可分为佛教建筑、道教建筑与民间神祠三类，其中佛、道两教的影响力尤为突出。“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唐，而学浮屠者为尤。合京城内外暨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声不能什一。”（潜说友, 2012, p. 2654）宗教区域作为城市最稳定、最可视的公共建筑之一，既承载吴越旧额与地方记忆，又在南渡后的国家重建与礼制实践中不断被改造，因此其空间分布因而成为观察南宋城市结构、权力逻辑与社会流动的切口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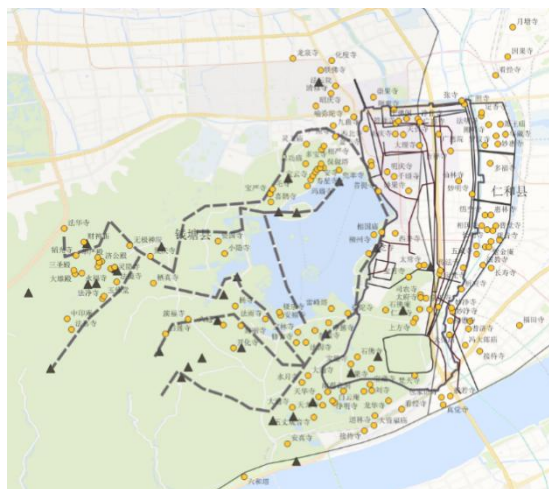
有关南宋临安宗教区域分布的相关研究以日本宋史学者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最具代表性。斯波义信（1988）曾绘制杭州主要佛寺、道观分布图并作出概述（p. 277）。在此基础上，包静（2014）、孙旭（2010）、王歆（2020）从地理格局、功能结构与社会网络等层面对临安寺庙进行考证，成荫（2013）、段玉明（2006）则从两宋比较的角度揭示宗教空间在政治更迭中的结构差异。在“空间转向”兴起的学术背景下，江莉莉（2010）认为宗教地理逐渐重视“地方性”与象征一意识形态维度的生成机制（p. 703）。南宋临安以皇城与西湖为双核，南北山路环抱西湖，配合三堤与三天竺路形成“二山抱湖、双龙抱珠”的形胜格局。本文在前贤时哲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方志、笔记等文献材料与 GIS 可视化，对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空间分布及其“地方性”成因进行探讨，尤其关注宗教空间与城市结构、权力逻辑及人群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

临安宗教区域的分布并非杂乱无序地散落，而是依托地形与城市功能呈现出有机的聚集与分区。整体上，佛寺在环西湖湖山间层累罗布，道观则借助政治力量安置在关键节点，民间神祠又以太庙为中心呈向心集聚。

### 1. 湖山叠映：环西湖层累罗布的临安佛寺

临安佛寺格局在横向空间上形成环西湖罗布的特征，在纵向时间上因修建年代的差异而呈现层累性。自东晋慧理开山立寺，经吴越“东南佛国”之盛，至南宋城湖互嵌、水网纵横的都城形态确立，佛教空间在西湖山水间不断被重组与再定位，既顺应山水地貌“因山就水”而布设，又在南宋以后逐渐显现景观化、园林化倾向，并最终与都市生活与礼仪秩序实现更高程度的适配，是佛教世俗化、本土化的物质见证。



南宋临安佛寺分布图 1<sup>1</sup>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佛寺的环湖分布并非随机散落,而是依托“山—水—城”的自然与人文基础形成五大节点集聚区。其一,凤凰山—吴山—都城集聚区地处城市核心,依托凤凰山、吴山等山体,融合皇城礼仪与市井生活,寺庙兼具皇家祭祀、文人雅集、市民信仰等功能。如千顷广化院为皇城祈福道场、明庆寺设戒坛,具备朝廷祈雨与设坛传戒功能;吴山之开宝仁王寺、太平兴国传法寺等则体现佛教空间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嵌合。其二,保俶塔—葛岭—孤山集聚区以历史遗迹为基底,佛教空间与文人文化深度交融,呈现出浓厚的人文化与日常化特征。苏轼、白居易、陈与义等文士对广化院、玛瑙宝胜寺的频繁题咏,使佛寺成为士人精神空间与地方文化地景的重要节点。其三,灵隐—飞来峰—三天竺集聚区作为“灵竺佛国”核心,以飞来峰为精神与地理轴心,沿山谷形成有序的佛寺聚落。灵隐寺作为祖庭之地布局规整,三天竺(法镜、法净、法喜)则沿溪谷依序排布,上天竺因祈雨灵应屡获皇帝驾幸,是国家级佛事场域的象征核心。其四,净慈—龙井集聚区以南屏山为市民佛教枢纽,南高峰为制度化佛教腹地,龙井谷地则是文人隐逸佛教的代表,功能分化显著。净慈寺面湖而建,是南屏山区域的主寺,香火鼎盛;南高峰慧因寺、法相寺、六通寺等构成制度化佛教网络;龙井延恩衍庆院则因辩才法师归隐而逐渐成为文人与诗僧交往的重要场域。其五,临安东郊集聚区佛寺数量最多,分布于城乡边缘,以交通节点为核心,多为中小寺院与庵舍,服务于城市扩张与民众信仰需求。候潮门、艮山门外如演法院、崇福院密集布局,临平、皋亭山等区域则聚集众多功德院与皇家寺庙,如慈云院、普济院,构成城市边缘的佛寺群。

从历时演变看,南宋临安佛寺的空间布局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在长期宗教地理基础上不断叠加、更新的结果。东晋时期,杭州城市中心大致位于今西湖以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慧理入杭开创灵隐与天竺等寺。至唐末五代吴越建国,佛教受到王权强力扶持,灵隐—天竺—南高峰一带形成密集佛寺聚落。北宋时期佛寺营建趋于克制,基本延续吴越时期格局,空间形态相对稳定。南宋定都临安后,佛寺分布在原有基础上再度调整与重构。南渡初期,在有限土地与财政条件下,朝廷与地方士绅多采取修复吴越旧寺、借寺置院、以寺为功德寺等策略,使南山路一带吴越旧寺更易为皇室功德院与攒寺。至中后期,随着湖山景观营造与文人游赏的兴盛,佛寺与游观经济、诗画题咏和士人交游深度嵌合,成为“湖山核心”叙事的重要支点。

从东晋的山林圣地、吴越的都城化佛教圈、北宋的整顿承续,到南宋的皇室集权,临安佛寺的层累结构正是都城宗教空间动态塑形的体现,佛寺不仅延续其信仰功能,也在地方认同与城市叙事中扮演核心角色。

## 2. 宫城核心：权力形塑下的临安道观

作为京师,临安道教宫观总数五十八,与城内外佛寺四百九十二相比数量逊色,然其与主流政治的联结度与礼制资源之丰,反而呈现出数量少而势力强的特征:“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但老氏之教有君臣之分,尊严难犯,报应甚捷,故奉老氏者倍加恭敬,不敢褻渎,此释氏之所不如也。”(吴自牧, 2017, p. 240)在空间分布上,临安道观的区位选择不主要受地形便利支配,其分布多位于被礼制需求与政治象征“挑选”出来的关键点位,如宫城附近、城内要冲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山水节点,而城郊分布则相对稀疏。

1. 本文所呈现图表均借助 GIS 软件对地图进行改绘,参考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以确定南宋临安府全境与各县的地理范围,结合南宋临安考古工程队确定的南宋都城、罗城与重要的行政区布局在地图上进行配准。由于南宋地名距今变化较大,故主要依据相对稳定的湖山之名兼以《咸淳临安志》四图所示的寺庙方位进行二次参对,以期还原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历史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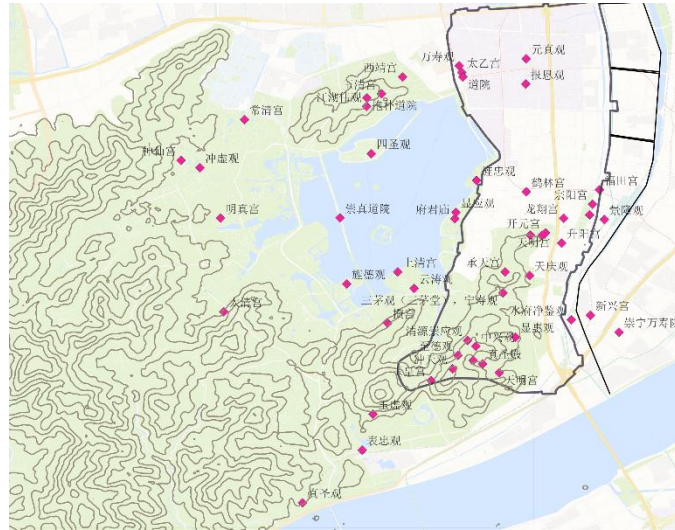


图 2 南宋临安道观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aoist Temples in Lin'an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分析图 2 可得，在统治者持续营建下，临安道教宫观在城内形成三处相对集中的支点：一是城西北钱塘门—余杭门一带，分布太乙宫、万寿观、景灵宫等皇家宫观，被安置在御街终点，奉宋室祖先神位，形成宗法与宗教交织的象征体系；二是吴山片区，为城内最密集的道教区域，开元、龙翔、报恩、元真、承天、冲天、真圣、宁寿（三茅）、天庆等观连缀成片，构成城内最醒目的道教宫观群；三是城东新开门—崇新门之间，宗阳宫、佑圣观、福田宫、景隆观等相对集中。这一片区道观在规格与影响力上不及吴山与城西北官观，却也以点状嵌入的方式在拥挤京城中开辟道教空间。

而将视野由城内扩展至湖山，道教势力在空间上还存在一个关键的支点，即北山路—孤山路一带。这里道观数量未必最多，却往往规模宏大、地位显赫，它们的建立常以佛寺空间的迁移、拆分为代价，直接呈现权力主导下的资源置换机制。北山路显应观的形成具有代表性：显应观专奉崔府君，被纳入皇室护佑叙事并获帝室累朝崇祀，其营建“分灵芝佛刹之半”（潜说友, 2012, p. 545）而成，显示道观扩张往往通过对既有佛寺资源的重分配来实现。孤山宫观则更为典型：绍兴十四年所建四圣延祥观与理宗淳祐十二年改置并安奉太乙十神像的西太乙宫不仅依托“湖心飞地”的象征位置强化道教显示性，而且据《咸淳临安志》所载，其营建伴随着报恩寺、观音智果院、广化寺、玛瑙宝胜院等寺院的改迁与并入。由此可见，佛寺在数量上虽占优势，道教却能凭借国家主导与礼制需求在关键节点实现“改寺建观”的区位转换，从而形成结构性的象征优势。

综上所述，临安道观的空间分布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在皇权主导与礼制塑形下被有意选址的产物。它们依托宫城核心展现出以改寺建观为代表的资源再分配逻辑。正是在这一由上而下的形塑过程中，道观得以占据城市宗教空间中的核心位置，成为皇权精神秩序的重要延伸与象征性节点。

### 3. 向心共生：环太庙分布的民间信仰寺祠

南宋临安城内的民间信仰寺祠，呈现出鲜明的环太庙空间格局。太庙作为国家祭祀祖先的核心礼制场域，周边环绕了具备多种社会功能的寺祠。其周边密集分布真圣庙、忠清庙、岳庙、太岁殿、皮场庙、城隍庙、护国天王堂、旌忠庙、梓潼殿、汉留侯祠等十余座寺祠。从类型看，既有维系城市秩序与司法伦理的城隍庙、太岁殿等，也有以忠义叙事凝聚人心的节义祠，如岳庙、忠清庙、旌忠庙等，亦可见梓潼殿等外来信仰，呈现出以礼制为核心的向心性。

这种向心式聚集，应在南宋民间信仰高度活跃、且国家不断动员神祇资源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进行解读。南宋的民间信仰并不局限于基层社会，官员与皇室同样广泛参与祈禳与祭告。南宋在南渡震荡



## 1. 地理与文化生成象征空间

地理与空间、场所与地方是地理批评的两对具备互文性的概念。地理为宗教区域提供现实基础，文化则赋予其象征意义，借助文化阐释，山体提供显圣的依托，水体将清静观念转化为可体验的仪式场景，植物通过构造景观完成宗教语义的在地化；同时，经由宗教文化通过命名阐释等方式的赋义，湖山被纳入宗教意义系统，宗教区域的象征性得以确立并持续强化。

临安宗教区域的象征空间，首先建立在“湖—山—城”互嵌的地理结构之上。凤凰山、吴山、玉皇山等山体既是城市制高点与视觉焦点，也是宗教空间理想的依托。它们一方面提供隔绝尘俗、趋向清静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又与西湖水网构成可达的交通与游观系统，使佛寺既能在山林中获得超越性，又能融入城市生活。其具体呈现可从山体、水体、植物三类自然媒介的参与方式加以理解。

其一，山体不仅承载寺观庙宇，更直接成为显圣的媒介。飞来峰孤峰挺立、岩洞嵌空的自然形态，本身即具有脱尘出世的视觉心理效应，而其山体洞窟如青林洞、玉乳洞、龙泓洞等在五代至宋代被广泛用于造像，使天然岩壁从可观之景转化为可朝拜观礼的场所。其二，水体把宗教清静观念转化为可体验的仪式场景。在宗教象征体系中，水常被视为清静的象征，以净慈寺万工池为例，其本是防火水池，后转为放生之用，外有重堤环绕、中央置假山花木与微型楼阁，既承载慈悲放生的教义表达，又以水面、堤岸、岛景的层次组合模拟仙佛世界，形成动静相宜的修持氛围。其三，植物以构景的方式塑造宗教体验，并完成宗教语义的在地转译。宗教区域中的植物不仅是构景元素，也承担宗教语义的象征意义，灵隐寺大雄宝殿西侧即有两株七叶树，七叶树在佛教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象征着小圆满、功德无量和生死轮回等佛教理念。正如白居易“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为僧家”（1988, p. 1843）一语所言，植物不仅是构景手段，更是修行载体、悟道媒介，使宗教秩序不仅存在于空间，也沉淀为可被讲述的文化符号。

其次，象征空间的生成关键还在于文化对自然的再命名与再解释。“灵竺佛国”的形成最具典型性：慧理借“灵鹫飞来”典故为飞来峰命名，将灵鹫山这一传说中的佛陀说法之地转化为信众可知可感的空间场域。其又并在周围连建五刹，使其由自然奇峰转化为佛国精神中心，此后灵隐与天竺依双谷展开，逐渐形成结构有序的佛教聚落。灵隐寺与飞来峰在空间上形成对望关系，由此生成“飞来传法—灵隐修法”的方位隐喻。随着吴越至南宋的持续营建，摩崖石刻、佛龛、石窟遍布飞来峰，其象征意义在实践性营造中不断实体化。玉皇山亦然，玉皇山原称“玉柱峰”，自唐代起即为道教圣山，吴越国崇佛背景下又被奉为“阿育王山”，转而成为佛教圣山。玉皇山孤峻高耸、视野统摄江湖山城的地貌特征，天然适配祀天、通神的象征期待，又因“玉”与“育”、“皇”与“王”皆指向王权象征，因此吴越时期郊台的设置、南宋皇室祭祀活动在此高度集中，以及钱王陵寝与皇室祠堂陵墓如褒亲崇寿教寺、净教院等的分布，共同将玉皇山塑造成兼具“祀天”“祀祖”意义的礼制空间。可见，地理形貌在文化叙事的解释中可以获得超越性的价值指向并持续影响其空间组织。

因此，杭州佛寺所依托的自然山水是在宗教叙事与营造中被持续赋义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性并不止于寺院建筑所构成的空间形式，而是深嵌入山水本身，自然地理与地质形态提供可感的形制条件，宗教叙事与营造实践提供可读的意义机制，二者叠合，才共同建构出具有超越意味的宗教秩序。

## 2. 政治与经济催化新生格局

南宋临安的宗教空间格局，并非地理文化的自然演化，也非对北宋东京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仿效与变通的张力中，深受政治策略与经济资源配置的牵引，共同催化出的新形态。所谓“效学汴京气象”（吴自牧, 2017, p. 269），主要体现在都城生活秩序的再造：北宋以来朝廷以制度化方式维持城市生活的等级差序，“效学汴京”更多是一种都城生活方式与秩序感的复刻，它为南宋在南方重新建构帝都

气象提供了社会心理与文化模板，但宗教空间的具体格局，却必须在南渡后的政治合法性叙事、礼制实践需求与现实资源约束中重新生成。

在政策与制度层面，南宋对宗教的治理框架基本沿袭北宋，其共同点在于宗教始终被纳入王权治理的工具体系之中。《宋会要辑稿》载高宗论佛教，认为“一度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而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故其态度是“但不使其大盛耳”（徐松，2014，p. 9991）。这种工具化不仅体现在观念上，更体现为高度制度化的行政管控与象征奖惩。从中央到地方的僧道管理体系、敕额制度、赐紫衣与师号、乃至寺院的等级化，都构成朝廷调度宗教资源的制度工具。《大宋僧史略》对“帘前师号”“帘前紫衣”的记述，正说明紫衣师号之荣观已成为朝廷笼络僧团、将宗教声望转化为政治依附的方式（赞宁，2015，p. 169）。与此同时，皇帝临幸与御书题额又进一步把宗教空间转化为政治象征空间：如《咸淳临安志》言南渡后高宗、孝宗、理宗都曾临幸上天竺灵感观音寺并多有赏赐之举（潜说友，2012，p. 2899），理宗也在灵隐寺留有御书“觉皇宝殿”等大字（潜说友，2012，p. 2874），这些行为不仅提升寺院威望与香火收入，也使政治权威以宗教仪式的形式不断被确认。

宗教制度可以延续，但宗教格局必须考虑实际情况。在土地紧张与财政约束之下，统治者必须把有限的空间资源，优先配置给最能支撑礼制实践与合法性叙事的宗教设施。宋高宗建都初期，必须借助地方士绅与大臣的土地支持，因此宗教区域的建立往往采取奉敕建寺、官员施宅建寺、民间自发营建等多样化方式，如景灵宫由刘光世旧宅改建，法雨院由王俊民舍地建立。同时，由于建庙耗资巨大，旧都东京的祠庙在临安仅有四座代表性重建，如皮场庙、昭节庙等，亦是出于成本与象征的双重考虑。更重要的是，为宣示皇权正统性与维护神佑中兴的神圣叙事，皇室主导的宗教设施在区位上往往呈现明显的选择性乃至逾制：如将地位低微的白马寺安排在太庙附近，有违前制；又如四圣延祥观，四圣不过是道教中第三等级的神仙，仅因为四圣曾保护宋室南渡，又因真圣与孝宗面容相似，宋廷便将其立于孤山之上，其规模与地理位置在所有的御前宫观中甚至超过太庙和景灵宫。

在这一空间生产逻辑下看，道教宫观的分布正是礼制配置与资源再分配的结果。赵宋王室将道教尊为国教，南渡初期朝廷亟需以宗法祭祀巩固合法性，御前宫观往往被布置在最具象征意义的区位，并通过拆寺建观、并寺入观等方式在空间紧张的都城中获得立足点；中期以后礼制体系趋于稳定，道观更集中承担祖宗奉安与国典仪式等功能，例如景灵宫孟飧、行香制度等，使其礼制属性进一步凸显；至理宗朝在孤山设西太乙宫，又进一步强化了道教在湖山关键位置的政治占有。北山、孤山等关键位置发生拆寺建观的宗教置换，也正说明宗教空间并非只属于信仰，而是国家在有限空间中关键区位进行支配与再分配的体现。同样的机制也作用于民间寺祠。民间神祠环太庙向心分布，并非单纯的民间自发，而是在赐封与祀典体系扩张中被制度化的结果。太庙周边由此成为政治控制与神权依赖交织的象征性中枢。

可见南宋临安的宗教格局受到政治统治需求与现实资源约束的共同催化，它在对旧都的仿效与现实的变通中，在城市空间建立起一套服务于王权合法性与国家礼制的宗教地理新秩序。

### 3. 移民与原住民引导聚合趋势

宗教空间的建设归根结底服务于民众，因此人口分布与社会结构因而对寺庙、祠庙的设立与兴盛具有直接影响，寺院能否兴盛，取决于其是否进入稳定的信众网络。南宋临安由于战争，外来移民众多，宗教区域的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临安原住民与外来移民的信仰差异。

首先，临安移民的地域性分布与地域信仰，推动了若干具备地域特色的民间寺祠在临安落地并形成局部集聚。北方移民主要集中在钱塘县：“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脱脱等，1985，p. 12949）。他们在临安重建的东京旧祠仅有四座，包括嘉应公祠、二郎祠、昭节庙及惠应庙。其中以皮场庙（惠应庙）最为兴盛，因其以治病、应试著称，深受士人青睐。虽庙址位于吴山，远离考场，但士人仍赴此祭拜

以求功名。南宋时期，皮场庙获得皇室赐封，建有多座行祠，理宗及谢皇后亦曾扶持，可见其宗教与政治地位的显著提升。

闽广船商移民多居于城东临海地带，其信仰核心为妈祖信仰，在临安建立了祀奉天妃的顺济圣妃庙。《咸淳临安志》载妈祖原为莆田林氏女子，屡显神迹，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封其为“灵惠夫人”（潜说友，2012, p. 2605），后历封至“灵惠协应嘉应善庆圣妃”（吴自牧，2017, p. 236）。顺济庙在临安南北各建一座行祠，规模宏大，香火兴盛，反映出海商群体的信仰需求与影响力。

川、湘移民则集中于吴山、凤凰山一带，此地被称为“客山”，多为外郡寄寓富户与江海商贾。该群体的代表性信仰为梓潼帝君，梓潼帝君为蜀中神祇，主掌功名禄籍，深受士人敬奉。南宋时临安在吴山承天观旁设梓潼庙，史载其“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吴自牧，2017, p. 236），并加封为“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遂成为士子求仕祈福的重要场所。由此可见，移民不仅改变人口结构，也通过社群信仰将外来神祇嵌入临安城市宗教网络。

其次，从整体人口密度与阶层分布看，临安宗教空间呈现出与人口结构相互折射的趋势。南宋杭州城是“南北展而东西缩的狭长市区”（阙维民，2000, p. 29）。日本学者斯波义信（2001）对此城市格局进行更细致的划分：西城垣外是西湖畔的别墅地、风景区，西城垣内是狭长的官绅区。盐桥运河东段的城垣内，中部是中产以下平民的居住区域，南部又是官绅区（p. 345）。据《咸淳临安志》载，临安城南厢人口视北厢为倍，信众密集使得即便城东南缺少湖山胜景，寺庙数量仍不输于湖山周围，反映出宗教设施在数量层面往往随人口就近分布。与之相对，城西、城北湖山区域虽寺庙数量较少，却因风景秀美、佛法尊崇，自吴越以来即获皇室与士大夫青睐，灵隐、天竺等地名僧讲法、文人游览频仍，宗教声望与影响力反而更高，所谓“国朝驻蹕，隐、竺之价日高”（潜说友，2012, p. 2891）。因此，临安宗教空间呈现东南多而小、西北少而强的等级化分布：前者对应平民与移民的日常供奉聚落，后者对应官绅与精英的资源投入与文化加持。这样的分布恰恰是临安人口数量与民众政治经济势力决定的。

综上，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聚合趋势，一方面由移民社群带来的外来信仰推动，在钱塘、城东临海、吴山、凤凰山等区域形成具有来源地特征环太庙而建的祠庙节点；另一方面则由全城人口密度与阶层分布所塑造，促成东南多而小、西北少而强的结构性分化。

##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文化意义

南宋临安的宗教区域，不仅是构成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承载了深层的文化精神意义。南宋临安宗教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既在于反映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更在于折射从“王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 1. 反映从“空间”到“地方”的文化认同机制。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的文化意义，首先体现为其完成了宗教空间从抽象“空间”向承载记忆、情感与认同的“地方”转化的过程。从地理批评的视角来看，地理是空间的物理基础，空间则是抽象、可规训的容器，而“地方”则是被人的文化经验所赋义的具体场域，是社会实践情感与记忆的沉淀之所，正如段义孚（Yi-Fu Tuan, 2017）所言：“当我们感到对空间完全熟悉时，它就变成了地方”（p. 60）。

祁立峰（2015）指出，佛教从山林走向城市，并不意味着神圣性的消解，反而反映出神圣通过政治制度、文人书写与日常实践进入城市生活的过程（p. 120）。在南宋临安，这种空间转义尤为明显。作为南宋行在，临安的宗教空间本身就具有重构性。宗教区域因位处城市的器华之地，不可避免地被城市生活所嵌入与重塑，原本肃穆清净的寺院空间，被商业活动、节庆香市、公共交流等日常实践不

断填充。

这种空间重构突出体现在空间功能的调整。西湖周边的佛寺园林，与城市山林无缝衔接，天然成为市民游赏、节庆集会、士人交游的公共空间。不仅如此，寺庙还通过大型法会、香会、施食、放生等活动与市民社会的节令节奏高度协同，在坊市民俗与商贸活动中强化其文化存在，使宗教经验变得可见可感，成为南宋临安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化纽带。同时，士人群体也通过题咏、游记、碑铭等文化书写手段，将保俶塔、雷峰塔、葛岭、孤山、龙井等地赋予象征性与人格化特质，转化为寄托修身之志、表达人格理想的文化空间，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宗教区域的情感认同，形成重叠于现实地图之上的文学地理。

从文学文本角度看，临安宗教区域还频繁出现在话本小说、笔记传奇等大众文学叙事中，成为地方认知的重要虚构维度。例如，《西湖三塔记》便是在《洛阳三怪记》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两者在人物结构、节令顺序与事件设置上高度相似，但《西湖三塔记》因其将故事嵌入杭州西湖三塔的地理空间，实现了叙事的在地化重构，从而获得广泛流传。三塔原为北宋元祐年间苏轼疏浚西湖时所建，用以划定湖中禁采范围，保障水源。该故事则将此现实措施宗教化为“镇妖压邪”之举，以塔镇水妖，回应临安水患频发的集体经验，六和塔之于镇江的民间传说，亦属同理，宗教信仰在此不仅提供对灾难的解释框架，也构建起地方社会的象征秩序。此外，《夷坚志》中记述的景灵宫道士、上天竺观音故事，以及《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灵隐寺与净慈寺的场景设定，也都使得这些宗教区域不仅成为叙事的背景，更是承载意义的“叙事地方”。随着故事的流传与反复讲述，不断加深对临安湖山寺观的文化认知，进一步深化了公众对临安宗教区域的情感投射与文化认同。

正是在这种文化书写与日常参与的叠加中，临安宗教区域才成为临安城市身份与地方记忆的空间化呈现：对皇室而言，寺院与礼制相互支撑，参与合法性叙事与国家秩序表达；对士人而言，寺院成为山水理想、人格修养与群体交游的文化场所；对市民与移民群体而言，寺院通过慈善、接待、施茶施药等功能进入世俗生活，提供精神慰藉与社会互助。山水提供形体，文化赋予意义，实践沉淀精神认同，临安宗教空间一方面承载历时叠加的文化沉积，另一方面又以共时的社会实践不断更新，最终把“空间”转化为可认同、可归属、可持续被讲述的“地方”，因此，宗教空间不仅是物质景观的构成，更是临安城市记忆的核心符号系统之一。

## 2. 折射从“王城中心”到“湖山中心”的地理意识转向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格局，深刻折射出地理意识的显著转变，其空间布局与文本书写均呈现出从“王城中心”向“湖山中心”演变的趋势。

一是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逻辑发生转变。邱晓（2019）指出，在传统的王朝空间观中，任何地点理论上都可被作为空间原点，这个原点往往带有“我”或“神”所象征的中心性。空间方位的确立与中心的认定密切相关，有了中心，才有四方上下；中心与周边、方位与原点，是彼此依存、对立统一的（p. 86）。古人以帝都为天下中心，皇帝凭借其天子的身份坐镇大地中央，中原文化则凭借其深厚的教化内涵，显现出相较于周边部族的文明优势，都城从而体现出天下中心所具备的神圣特质与优越地位。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7）中频繁使用“四至八到”，通过描述各州县距离东京等核心城市的路程作为表示方位距离的方法来定位各州县，其记载杭州“四至八到”如下：

“东北至东京二千八百里。西北至西京二千五百里。西北至长安三千四百里。东至苏州三百九十里。南至越州一百三十里。北至湖州一百九十里。西至歙州四百七十九里。东南至思俗山至越州总一百七十里，又云渡浙江一百三十里。西南至睦州三百一十五里。西北至宣州四百九十六里。东北至苏州三百六十九里。东北浙江入海处一百里。”（p.1862）

无论城市距离国都东京远近，都会以东京为第一坐标进行衡量，可谓这一地理中心意识的直接呈现。

北宋东京的宗教空间布局充分体现了这一中心主义逻辑。重要佛教寺院如相国寺、太平兴国寺等，集中于皇城附近，承担国家祈雨、科举题名等功能，是皇权与宗教相互映照的象征性场所；道教宫观如玉清昭应宫、上清宝篆宫等，同样位于宫禁要地，强化“天人合一”的合法性结构。这种自上而下、放射状的“宫一坊一市”空间次序，反映出北宋制度化、等级化的宗教管理逻辑。相比之下，南宋临安宗教空间受地形影响更大，政治主导性相对减弱。佛寺主要分布于西湖周边山地，形成环湖五大集聚区，呈因山就水之势，环西湖佛寺中，既有皇室功德院、国家祈雨场所，也有市民日用佛教与文人游观结合的隐逸空间，呈现制度性与民间性并存的特征；道观多位于宫城近旁及礼制象征节点，体现出逾制建观的皇权介入特征，强化了政治象征地位；而民间信仰寺祠则以太庙为中心形成环太庙式的向心结构，显示出民间信仰在国家礼制吸纳下的整合化与多元共生。

如图 5、图 6 所示，这种空间布局不再服从“宫一坊一市”的等级秩序，而是在“城一湖一山”的地貌基础上，构建出宗教区域之间互为依托、彼此交织的复合空间网络，反映出从以皇权为轴心的中心主义布局向以自然地貌与民间实践为依据的地方性空间结构的转变。



图 5 北宋东京宗教区域分布图/图 6 南宋临安宗教区域分布图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Areas in Northern Song Dongjing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Areas in Southern Song Lin'an

二是空间叙事结构发生同步转向。潘晟（2008）提出，宋廷南渡后，由于偏安一隅、失土辱国的历史创伤，逐渐放弃了整体“图绘天下”的企图，转而追溯“禹迹”、绘制“华夷”，试图在“文化天下”的叙事框架中，重建一种象征性的家国秩序与政治地位（pp. 116-117）。这一转向，标志着从“疆域天下”到“文明天下”的地理认知转型，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地理书写的结构逻辑。《咸淳临安志》《太平寰宇记》等地志不仅是地理事实的记录，更体现了士大夫对“地方”与“中心”重新定位的尝试。

临安三志中最为完备的《咸淳临安志》序文鲜明地体现了以潜说友为代表的南宋士人所特有的地理意识：“《禹贡》称‘冀州既载’，释者谓以贡赋役事载之书。其于天子所自治之国，谨重固如此。九州岛攸同，言归旧京。圣子神孙，尚克念哉！光尧怀禹之遗志云。”（潜说友，2012, p.6）潜说友在其绘制的《九县山川总图》中，并未将都城临安置于画面中心，但在表达方位时依旧沿用城内、城外的分区模式，体现出一种试图从皇权中心出发对城市进行空间重组的努力。这种划分方式反映出他所坚持的“王城中心”地理意识，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空间组织结构，也暗含着士人对“权力中心”失落的深层焦虑。然而西湖作为空间实体的实际地位，早已超越了“城外”的边界。因此，潜说友在划分寺院布局时，不可避免地采用围绕湖山的片区结构，而非传统自皇城中心出发的等级差序逻辑，

这一空间叙事方式变化显示出尽管南宋士人仍保留城内、城外的皇权空间划分，但其对佛教空间的书写和分区，实质上已转向以西湖为地理核心的空间认知，这正是南宋临安城市空间在经历政治中心转移与地方意识增强之后，自然生成的结构性回应。

南宋临安宗教空间的建构，是自然地形、历史传统与政治格局多重作用下的产物。临安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等三类主要宗教区域的地理分布特征并非散乱无序，而是各自遵循特定的空间逻辑：佛教寺院依山环湖，道教宫观扼守礼制节点，民间寺祠则围绕太庙形成向心集聚态势，整体呈现出一种共生互嵌的空间格局。临安宗教空间的建构受到地理与文化、政治与经济、移民与原住民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塑形，体现出历史传统与现实格局的层层叠加与互动。从文化意义层面看，临安宗教区域不仅作为地理实体参与城市运作，更通过制度表达、日常实践与文学书写，完成了从“空间”向“地方”、从“王城中心”向“湖山中心”的叙事转型，成为临安维系地方认同、凝聚文化记忆与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载体。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MA Xiaokun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3542-257X>

CHEN Siyi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3-6731-9833>

#### References

- (唐)白居易(2023):《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 [BAI, Juyi (Tang). (2023). *Annotating and collating on Collected Poems of BAI Juyi (Baijuyiji jianjiao)*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ZHU Jincheng).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包静、王兴臣(2014):“南宋吴山宗教寺观探析”，《杭州文博》(01):116-124。
- [BAO, Jing, & WANG Xingchen (2014). A study on religious temples and Taoist monasteries of Wusha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ngzhou Archaeology and Museum Review*, (1), 116-124.]
- (宋)陈淳(1983):《北溪字义》，熊国祯，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
- [CHEN, Chun (Song). (1983). *Neo-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 (Beixi ziyi)*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XIONG Guozhen, & GAO Liushui).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成荫(2013):“北宋开封神祠文化在南宋临安的转移与延续——以东京旧祠为中心”，《中华文化论坛》(06):97-102。
- [CHENG, Yin (2013). The transfer and continuation of Kaifeng shrine culture from Northern Song to Lin'an in Southern Song: A case study centered on former shrines of Dongjing.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e*, (6), 97-102.]
- 祁立峰(2015):“城市与山林之间：论南朝佛教诗赋的空间书写与权力结构”，《东吴中文学报》(30):99-125。
- [CHI, Li-Feng (2015). Between urban and nature: A study on landscapes writing and power structure of Buddhism Shi and Fu on Southern Dynasty.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0), 99-125.]

- 段玉明（2006）：“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宗教文化转移之实例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3）：33-39。
- [DUAN, Yuming (2006). On former Kaifeng Taoist monasteries rebuilt in Hang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33-3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766.2006.03.006>]
- Kong, Lily (2010). Global shifts, theoretical shifts: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relig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6), 755-776.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0362602>
- 李利安（2008）：《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宗教文化出版社。
- [LI, Li'an (2008).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Guanyin belief*.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 （宋）马端临（2011）：《文献通考》，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
- [MA, Duanlin (Song). (2011).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literature (Wenxian tongkao)*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Research Institute on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Institute of the Studies of Ancient Books & Writing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潘晟（2008）：《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PAN, Sheng (2008). *Ideas, system and interest in the geography of the Sung Dynast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宋）潜说友（2012）：《咸淳临安志》。浙江古籍出版社。
- [QIAN, Shuoyou (Song). (2012). *Records about Lin'an from Xianchun reign (Xianchun Lin'an zhi)*.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邱晓（2019）：“论柳宗元山水文学空间书写的原型结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9（02）：84-91。
- [QIU, Xiao (2019). On the prototype structure of LIU Zongyuan's space writing.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9(2), 84-91. <https://doi.org/10.16152/j.cnki.xdxbsk.2019-02-010>]
- 阙维民（2000）：《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
- [QUE, Weimin (2000). *Hangzhou city and West Lake: A historical illustrated account*.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斯波义信（1988）：“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历史地理》（01）：268-282。
- [SHIBA, Yoshinobo (1988). The urban ecology of Hangzhou, capital of the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Geography*, (1), 268-282.]
- 斯波义信（2001）：《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SHIBA, Yoshinobo (2001). *A study on economic history of Jiangnan in the Song Dynasty* (FANG Jian, & HE Zhongli, Trans.).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孙旭（2010）：《宋代杭州寺院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SUN, Xu (2010). *A study of Buddhist temples in Hangzhou in the Song Dynas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段义孚（2017）：《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Tuan, Yi-Fu (201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WANG Zhibiao, Trans.).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脱脱等（1985）：《宋史》。中华书局。

- [Tuotuo et al. (1985). *History of the Song (Songshi)*.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王歆 (2019): 《杭州山寺与泉溪的关系研究》。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WANG, Xin (2019).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ngzhou mountain temple and their stream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王兴平 (2003): “刘安胜与文昌经”，《中国道教》(05): 31-34。
- [WANG, Xingping (2003). LIU Ansheng and Wenchang Scriptures. *Chinese Taoism*, (5), 31-34. <https://doi.org/10.19420/j.cnki.10069593.2003.05.013>]
- (宋) 吴自牧 (2017): 《梦粱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全宋笔记》(第八编第五册), 大象出版社。
- [WU, Zimu (Song). (2017). *A dream of sorghum (Menglianglu)*. In Research Institute on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Ed.), *Complet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Quansong biji)* (8th Series, Vol. 5). Elephant Press.]
- (清) 徐松 (2014): 《宋会要辑稿》,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 [XU, Song (Qing). (2014). *Song Government Manuscript Compendium (Songhuiyao jigao)*.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LIU lin, Diao Zhongmin, SHU Dagang, Yin Bo et al.).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乐史 (2007): 《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
- [YUE, Shi (2007). *Universal geography of the Taiping era (Taiping huanyuji)*.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宋) 赞宁 (2015): 《大宋僧史略校注》, 富世平校注。中华书局。
- [Zan Ning (Song). (2015).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An Outlin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Song Dynasty (Dasong sengshilüe jiaozhu)*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FU Ship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曾枣庄、刘琳编 (2006): 《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
- [ZENG, Zaozhuang, & LIU Lin (Eds.). (2006). *Complete collection of prose writ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Quansongwen)*.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祝尚书 (2009): “科举守护神‘文昌梓潼帝君’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 30-37。
- [ZHU, Shangshu (2009). On Wenchang Zitong Dijun and his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5), 30-37. <https://doi.org/10.3969/j.issn.0438-0460.2009.05.004>]

(校对编辑: 张平 张弛)